

七十年前的那一刻，我们都在

我们在这里播出了胜利之音

◆ 杨俊

1949年5月25日黎明时分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进行巷战。党支部委员张啸峰赶来了，我兴奋地说：“你快布置任务吧！”他解开一包整齐的小纸包，把印着“人民保安队”字样、红字白底的布质臂章交给我。当时，我是南京路新新公司纠察大队长、地下党员。我说：“坚决完成党支部交给我的任务，请党放心！”接着，他又从贴身的口袋里取出了一张又小又薄的打字纸，上面复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，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签发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》，说：“马上要向全市人民广播！”

我接过了“布告”，带领一小队人，往五楼“凯旋”电台飞奔。电台经理看到我们，连着后退了几步。我们抢前一步，说明来意，“一切费用，我们可以如数付清。”他讷讷地说：“警察局对电台管理有规定……”我们马上郑重地说：“国民党警察局吗？已经插白旗投降了！这里的事由我们人民保安队负责，你可以放心！”那个经理半信半疑地到窗口探望了一下，见到白旗确实已经在那里插着了，才说：“应当效劳，那么就请吧！”

李云森一个箭步，跑进播音室，打开开关，开始播音。可收音机却收不到声音。经检查，发现电台播放频率被故意拨乱了，于是马上调整过来。此时，他激动地向全市人民宣布：“我们上海人民解放了！亲爱的同胞们，上海人民保安队播音开始！人民解放军已来到南京路！”就这样，电台播放了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》。党支部又及时拟出了敌军投降“三项保障”，同时，播放了由歌咏队演唱的《我们的队伍来了》等欢迎解放军的歌曲。

播音开始不久，有个国民党特务，腰挎小手枪，带了五六个打手闯进来，冒称是“共产党地下政工人员”，胁迫电台停止广播，被我人民保安队员拦在外面，未能得逞。这帮家伙并不肯死心，下午四时许又来了，拿出所谓“共产党地下挺进军”的“委任状”，扬言来接管电台，但再一次被我们轰了出去。

电台播音传遍了整个大上海，强大的宣传攻势发挥了作用。被我军包围在浙江路桥北碉堡里的一百多个敌军官兵，听到广播后挂出白旗，缴械投降。苏州河以北地区，许多被困的敌军官兵纷纷打电话来询问：“接受缴械有什么手续？”我们作了明确的答复，促使他们尽快投降。

我们连续广播了三天，分别用普通话、广东话、上海话，还组织由各大公司的歌咏队演唱上海流行的进步歌曲，各方反映强烈，效果极好。我们的政治宣传，配合了军事进攻。27日，人民解放军攻克了苏州河以北地区，肃清了全部敌人。28日，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，将电台移交给了上海市军管会。

回想这段战斗历程，深感我们这群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正是靠着党的领导，才不怕艰险，勇敢斗争，为人民做出了一点有益的事。

在闹市

那时我们住在四川中路靠近北京路的三和里。这条弄堂商业气色很浓，大部分是广东人，而顺德人开的香云纱店居多，也有经营药材和各种贸易的，外公和亲友合资也在这里开了一家纸店，经营文房四宝。外公的人缘好，加之店面比较宽敞，弄堂的乡亲，都喜欢下午闲时来坐坐，看到外公，叫一声“老板”，就随便找个位置坐下，也不需要倒茶，递烟招待，就天南海北地谈起人情世故、生意往来等。话题转到时事政治方面，特别是当前的形势成了重要的话题。当有客人提到共产党（那时还不会叫解放军）到济南、徐州……了，很快就会打到上海时，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起来了。这些商人，多是有文化之士，但也听到各种传说，心有纠结。也有人认为，如果说共产党不好，北平和谈了，还能占领那么多的地方，听说还很太平，而现在老蒋搞得社会动荡，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……毕竟是商人，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生意和个人的财产，大家内心矛盾之极，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

外公也喜欢听他们议论，含着烟斗，不时点点头，偶尔也插两句，我放学后，也常听到他们还在议论，在这里各抒己见，没有争论，却成了议而无果的“议事堂”。



■ 欢迎解放军，工人学生市民们纷纷和解放军同志握手，有的索性爬上了汽车（照片由吴联膺提供）

从斜桥一路往北走

◆ 胡士忻

1949年5月中旬，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。国民党一方面将重要物资偷偷地运往台湾，一方面组织残军负隅顽抗。当时，我就职的国孚商业银行，地处北京东路近福建中路，5月24日上午，门口突然传来鞭炮声、锣鼓声和口号声，原来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了一批无知游民，打着大幅标语，分乘几辆大卡车，说是“共军已被打退”，因此举行“祝捷大游行”。但这一闹剧能骗得了谁！我行总经理嘱大家，下午银行打烊，别留在外，赶紧回家。

我当时住在斜桥附近，在回家的路上看不出异样，晚上也很平静，接连几夜的炮声也听不到了。次日一早起来，照常出门，准备乘公交上班。可是车站上没有车，只听到大家在议论说，解放军已进市区了。我有点不信。部队进市区，一定是成千上万人，怎么晚上一动静也没有，马路上也未见一名军人？

没车可乘，我就步行去银行。由肇周路往北走，只见从斜桥到老西门这一路段两旁人行道上躺满了解放军。听人说，解放军是深夜来这里的，为了不扰民，不影响这一带居民的安眠，他们走路时，尽量做到不出声；当部队领导低声下令后，就全部和衣、抱枪、席地而卧，真正做到了“秋毫无犯”。住在

这里的居民，大都也是在早晨出门时，才发现解放军来了。见此情景，一股“肃然起敬”之情，骤然从心底升起，“啊，解放军真伟大！”立马回想起，就在几天前，有多批“国军”来银行闹事，他们把枪在柜台上一放说：老子为了你们在前线打“坏蛋”，你们应该慰劳慰劳。不答应？你们这么小气，是爱国吗？给金元券不要，要银元。两种军队一对比，谁是“匪军”，一目了然。

从老西门一直向北走，进入闹市区，没再见到解放军。到了福建中路南京东路口，几位工人纠察队员劝阻路人不要再往北走或张望，因苏州河以北还未解放，经常有流弹飞来，有危险，我就只得回家，直至27日才上班。

上海的解放带来了新气象，特别是广大青年很有感触。我和银行内的青年都纷纷加入青年团。私营小银行无法适应新环境都倒闭了，国孚也不例外，我失业了，但很快就由团市委介绍到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，成了一名公务员。我的人生完全改变了，由一名被剥削者，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国家干部。不久我又入了党，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在银行

三和里的“议事堂”

◆ 李钧衍

5月25日，住在三和里的居民一早起来，大人要上班，小孩要上学，可是出不去。一个管弄堂的老伯说，戒严了，随即把铁栅门锁上，不久就看到国民党兵贴着墙壁一个个向北移动，接着出现了零散枪声，有大胆的人还站在弄堂口观看。随着密集的机枪声，大家都担心受怕地回到屋里。奇怪的是两天过去了，没有听到重炮声和房屋倒塌声。有人在二楼窗前看到通向北京路的小弄堂内，有军人在潮湿地上睡觉，有的在吃饭。到26号傍晚，好像没有枪声了，有几个军人打开铁门（因有个变电站平时关闭）出来，其中有个当官模样的军人同几个大胆的人说话，似在做宣传。27日一早弄堂的铁栅栏打开了，人们纷纷涌向街上。上海全部解放了。

以后几天，三和里又恢复正常生活，但商家的“排门板”还不敢拿下来。人们又像往日那样到外公的“议事堂”来了。看到外公，第一句话就是老板这几天可好啊，没事吧？然后哈

哈哈地都笑起来了。接着话题又打开了。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没有听到炮声，楼没倒一座，就这样两天解决啦。不仅水电没有断，双方地区还能通电话。奇迹，奇迹。也有人谈到，很多当兵的就睡在水泥地上，请他们到屋里休息都不肯，起“床”后还清理障碍物，打扫卫生，真了不起，真了不起，这辈子从未见到过这样的军队，真是英勇之师，仁义之师啊！难怪国民党被他们打败，佩服，佩服。更有人说看了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》和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》后的感触，“约法八章”中提到保护全体人民生命财产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，心中疑团终于解开了。还有个人说，原来以为共产党这些土枪土炮，对付美式装备的国民党起码也要打个十天半个月的，我买了很多米和十几斤猪肉，现在只好放盐，腌咸肉了，眼看黄梅天就要到，不知大米会不会发霉呢。另一个客人说，你如果做成腊肠，我可以帮你解决一些，现在谁会吃你的咸肉啊。引来大家哄堂大笑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多很多珍贵的记忆。有的很快淡忘了，有的却一辈子记得清清楚楚。我最最珍贵的，就是七十年前五月的一天，具体说就是1949年5月24日。

那时我正随教书的父亲，寄住在浦东金家桥东南三里地远一个叫马家弄的村子里。那阵子，因为解放军已兵临城下，学校早已不再上课了。而国民党还想作垂死挣扎，每天到村子里来拉夫，在公路边挖壕沟筑碉堡，每个人家都有人被拉去，连我那小脚的妈妈，也去过几次。大家恨透了国民党，希望解放军早一点打进来，把反动派赶走。

24日那天天刚蒙蒙亮，我和我那小脚妈妈还蜷缩在屋外的防空洞里，只听有人喊：“解放军进村来了！解放军进村来了！”我顾不及穿鞋子，呼啦一下就爬出防空洞，只见一队扛着枪的解放军，臂膀上系着白毛巾，正向村子走来，在金色阳光映照下，显得十分英勇雄伟……

解放军就驻扎在村边堆柴草的祠堂里。村里的张大伯挑了两桶开水过来，招呼解放军喝水，并嚷嚷叫我们这群孩子把路边的那堆砖头搬来。很快，他搭了个土灶头，那个解放军把背着的大铁锅朝土灶上一放，就开始烧饭了。这时，大多数战士都抱着枪，躺在稻草铺的泥地上，呼呼睡觉了。张大伯轻轻对我们说，昨夜后面碉堡里的敌人很顽固，几次冲锋后才投降，所以他们都很辛苦，现在让大家好好睡一觉。你们回家到田里挑点菜来，再喊几个阿奶阿姨过来，帮着烧点菜，让大家吃个饱，说不定夜里还要攻打什么地方呢。没多久，村里来了不少人，我的小脚妈妈也在里边。我上前拽了拽她衣角，轻轻地说：“别人家都到田里给解放军去挑菜，我家可没菜田，多不好！”妈妈说：“赶快把家里那罐腌的咸鸭蛋拿来！”我高兴地赶紧朝家里奔去……

到了下午，来的人更多了，因为大家早就听说解放军是爱护老百姓的。到处洋溢着浓浓的亲切氛围，有几个小伙，甚至索性坐到稻草地上，要解放军讲讲昨日夜里攻打碉堡的事。一位短头发的女兵突然站起，亮着嗓门说：“我们来给乡亲们唱个歌罢！”只见她右手朝上一抬，嘹亮的歌声就响彻起来：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，民主政府爱人民哟，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……”唱完歌，这位女兵又把一张纸朝墙壁上一贴，原来是歌词，她笑着对围着的村民说：“老乡们，你们想不想学？”那些上了年纪的长辈，都不好意思地笑着朝后退，而我们这些读书小孩子，早已按捺不住，一面拍手一面蹦蹦跳跳着直呼：“学唱歌！学唱歌！”就这样，她唱一句，我们就跟一句。跟了几遍后，不但我们这些读书孩子都会唱，连那些阿姨们也会唱了。最后合唱的时候，歌声已经非常整齐嘹亮了。很快，这歌就传开了，村村户户都能听到这好听的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……”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一天，脑子里还反复想到，因为这歌唱出了我们天下穷人的心声，所以传得那么快，唱得那么响。

人到，歌到，解放到

◆ 徐林

在村头

“会议”就这样结束了。由于党的入城政策，解放军严明的纪律，两三天就让一部分人心中的疑惑、害怕一下子烟消云散了，更迎来人们的敬佩和拥护。

乡亲们离去后，外公即叫二楼的贺先生帮忙，把共产党打上海的情况写封信寄到香港再转到广东及乡下，让老家的人们放心。贺先生一口就答应了。晚饭后约两小时，他不仅综合大家所说，还把自己看到和想到的写了两张信封纸。外公很满意，又要我抄几份。那时没有复印机，复写纸又写不清楚，我只好用钢笔抄五六份，写得我手都痛。贺先生写的详细内容我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有一句：那些穿着土布黄军装和布鞋、打着绑腿的解放军，扛枪站岗的英姿，给上海市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这不知深浅的毛头小子竟一时冲动，当起“编辑”，把我在四川路桥前看到的一幕：一个解放军战士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国民党的坦克上，用几句话加上。好在贺先生没有审核，否则不被骂也要笑我的。这几封信分别经香港的亲戚转到广东，相信会起到一些作用，可惜没有留底稿，否则也可作为见证历史的“文物”了。

在弄堂